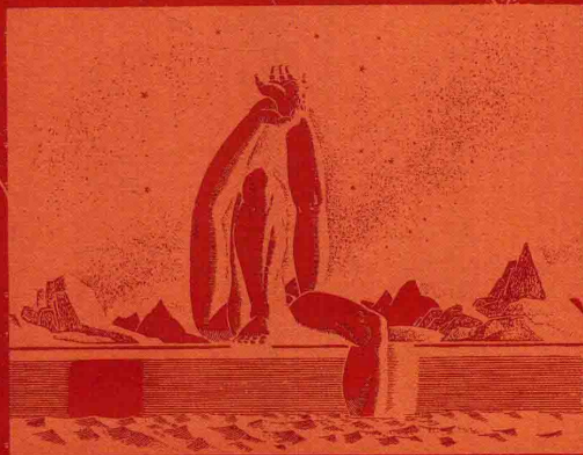


另起的新文化運動



采銅文丛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袁一丹 著

采銅文丛

Copyright © 202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另起的新文化运动/袁一丹著. —北京: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21.10

(采铜文丛)

ISBN 978-7-108-07236-8

I. ①另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五四运动—研究 IV.
①K261.1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1) 第 169243 号

责任编辑 王婧娅

封面设计 黄越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2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2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mm×965mm 1/16 印张 19.75

字 数 326 千字

定 价 69.00 元

目 录

- 001 引言 松动的“起点”
- 007 第一章 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名与实
- 007 一 “反套”在《新青年》上
- 013 二 “五四”：“文化”还是“武化”
- 020 三 研究系与北大派：“争个你偏我正”
- 037 四 学衡派的张冠李戴
- 050 第二章 新文化的运动机制与权势落差
- 050 一 纵的持久与横的扩张
- 059 二 文化运动与地方新政
- 065 三 新文化的金字塔
- 079 第三章 新文化人的自我改造
- 079 一 从“半依”到“半农”
- 089 二 “耻辱的门”
- 094 三 陆沉中的自我救赎

100	四 “瓦釜”之声
104	五 “战士”与“文娼”
106	第四章 交换广告中的新文化联盟
106	一 新文化的“地方代理”
113	二 “五四”前后的杂志联盟
118	三 阅读共同体
125	四 民初杂志界
133	第五章 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
134	一 最后之因还是个别之因
141	二 科学救国抑或文学救国
154	三 视同“阑尾”的《去国集》
171	第六章 作为社交手段的新诗
174	一 新诗的自我窄化
179	二 受质疑的送别诗
190	三 “社会化”的修养
194	四 诗可以群
200	五 海外组党的挫败
205	第七章 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
208	一 《何典》的再出土

213	二 疑古“废话”
219	三 从字体到文体
224	四 “射他耳家”
232	第八章 创造一种新的可读性
233	一 系于声气抑或文义
244	二 亚东版《水浒》与金圣叹批点
255	三 眼的文学革命
265	第九章 心理实验与汉字命运
267	一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聚光灯外
273	二 横读与直读之争
280	三 仪器背后的原理性思考
286	四 汉字的“格式道”
295	参考文献
306	后记

引言 松动的“起点”

你没有看见吗，一切发生的事怎样总是重新开始？那就不能是神的开始吗？啊，开端的本身永远是这般美丽！如果他是最完全的，那么渺小的事物在他以前就不应该存在吗，以便他从丰满与过剩中有所选择？

——里尔克

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需要指认一个起点，起点本身即包含着叙述者的意图与方法。所谓“另起”，并非用一个起点去置换另一个起点，用新的历史叙事去推翻已有的历史叙事；恰是要并置不同的起点，对勘历史叙事的不同版本。

并置不同的起点，通过文本对勘重构历史（history though textual criticism），是为了对抗“起源”的神话。按萨义德（Edward W. Said）的区分，“起源”（origin）掩盖差异，是唯一的；“开端”（beginnings）凸显差异，是复数的。“起源”是神学的、神秘的、有特权的；而“开端”是卑微的、人造的、不断被检验的。^①从单一的起源中可以“离析”出多重

^① 萨义德（Edward W. Said）：《开端：意图与方法》，章乐天译，北京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4年，第10、16、34页。

的开端。在历史开端处发现的不是起源的同一性，而是种种人事的不一致、不协调。“开端”中隐伏着复数的起点、复数的历史时间、复数的个体经验，它有意挑战“起源”的权威，不断制造出另一个起点。

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，始于2008年。硕士论文《“新文化运动”发生考论》即处理新文化的“起点”及运动过程。现在回过头去看，有点佩服自己当初的勇气。事实上，自己并没有能力重构五四新文化的总体图景。当时的勇气，可能源于确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入口。从这个入口进去，仿佛能窥见一点微光，由此辟出新的论述空间。

这个选题有一定的偶然性。据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“一个中心”（五四运动），“两个基本点”（周氏兄弟）。选题时不知道去哪儿找题目，索性从《鲁迅全集》读起。没想到运气不错，《全集》第一卷还没有翻过半，就瞥见《热风·题记》中的一段话。鲁迅说“五四”以后，之前讥笑、嘲骂《新青年》的人，“另起”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，叫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后来又把这个名目“反套”到《新青年》身上^①。按鲁迅的说法，《新青年》与当时所谓的“新文化运动”不是一回事。这有点违背文学史的常识，现代文学史一贯把《新青年》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，新文化运动不就是《新青年》同人提倡的，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文化运动？

由鲁迅《热风·题记》里的这段话，我生出几个疑问：

《新青年》提出的“文学革命”“思想革命”与当时所谓的“新文化运动”究竟是什么关系？鲁迅之外，其他《新青年》同人怎么看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个名目？

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到底是谁的“发明”？

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个名目如何被“反套”在《新青年》头上？

硕士论文中隐含的方法论意识：一是对于语词的时态的敏感，用现在

^① 鲁迅：《热风·题记》，作于1925年11月3日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292页。

进行时的“新文化运动”取代过去完成时的新文化运动；二是浑朴的过程的观念，追问“五四”与“新文化”是如何“焊接”在一起的；三是倾听不合时宜者的声音，关注新文化的排斥机制及自我压抑的面向。以语词、过程、个体为支点，撬动固有的起点。

通过考察胡适、陈独秀、周作人等关于“新文化运动”的表态，我发现，至少在1920年代前期，《新青年》同人普遍认为所谓“新文化运动”是在文学革命、思想革命之外“另起”的事业。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出现在“五四”以后，即1919年下半年。这个词的发明权，主要归功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。

逐页翻检“五四”前后研究系掌控的北京《晨报》《国民公报》及上海《时事新报》，我得到的基本印象是，“新文化运动”表面上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反题出现的，但骨子里是一种泛政治运动，承担着为政党政治造血、换血的功能。“五四”前后文化与政治的共生关系，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（Möbius strip）。当把正反面扭转为一个单侧曲面，其间存在一个“拧劲”。“五四”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及“新文化运动”的裂变，即隐藏在文化与政治这个“不二之面”构成的“莫比乌斯带拧劲”当中。

重新翻看2008年撰写的硕士论文，站得住脚的或许就是这篇论点的“起点”，即从鲁迅《热风·题记》里无意间发现的历史缝隙。但写论文光靠灵光一闪是远远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服别人。我当时没有能力从这条缝隙深入进去，把从历史现场拾得的碎片，拼成一幅新的图景。

语文学家奥尔巴赫（Erich Auerbach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特别强调“起点”（a point of departure/Ansatzpunkt）之于历史综合的重要性^①。他

^① Erich Auerbach, “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,” trans. by Maire and Edward Said, *The Centennial Review*, vol. 13, no. 1 (Winter 1969), pp. 1–17. 中译本参见埃里希·奥尔巴赫：《语文学与世界文学》，靳成诚译，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》2016年第1期。

认为“起点”的发现多凭个人的直觉，因而基于内在视点的综合历史（a synthetic history-from-within）也只能寄希望于个人。“起点”好比是研究者掌控的“手柄”。一个别致的起点，足以撼动整个历史图景。光有总体史的抱负与轮廓是不够的，必须沿着起点指示的路径，寻求可以深描的现象。理想的起点应该既是具体而精准的，又具有向外辐射的潜力。对历史概念的词源学考辨，对经典文献的拆解与重构，对个人前史的打捞与修复，都可以成为通向自内而外的历史综合的跳板。

二

可是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们，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，作为我们的禀赋，作为我们命运的负担，作为循环着的血液，作为从时代的深渊生发出来的姿态。

——里尔克

我写完硕士论文后，仍旧没有解决的困惑是：我们有没有可能在“常态”下，纯粹从学理的动机出发，凭借研究者有限的个人经验，重新认识“五四”、认识“新文化”？此前关于“五四新文化”的叙事模式，都形成于历史的危机时刻。成功的“改写”，“势”大于“理”。我们这代学院体制培养出来的“新青年”，连个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，怎能讲好“新文化”从哪里来、往何处去这样的宏大叙事？“历史”对我个人而言，好像被缝合得严严实实。你很难动摇他人心中的定见，即便你用绣花针挑破一条缝，有可能由此撕开历史图景的一角。^①

重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，困难之处还不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、堆积更多的历史细节，把故事讲得无比

^① 参见袁一丹：《绣花针与狼牙棒》，《文艺争鸣》2018年第9期。

繁复、细腻。我感到真正的困难，恰在于胡适所谓的“价值重估”，如何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，重新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，进而重估新文化的价值内核。没有一个新的价值旨归，大概只能复述或修补原有的叙事模式，不可能把新文化如何发生的故事讲出什么大的新意来。^①

“五四”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石。长期以来这块奠基石过于稳固，以致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当“五四”的历史定位逐渐松动，变成一块“滚石”时，既给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，而在危机中或也蕴涵着自我更新的生机。

对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，围绕“五四”的思想论辩，与其说是枪口一致对外的保卫战，毋宁说是“今日之我”与“昔日之我”的较量。发言者需根据当下的社会氛围，纠偏除弊，适时调整自家立场。现代文学研究者既是“五四”遗产的继承人、保卫者、辩护士，也应直面“五四”近百年来的历史后效，在与反对者、调和派的思想对垒中，将何谓“五四”重新问题化，从而生发出新的时代命题。

在专业领域内隐然有两类“五四”言说，或将其视为历史事件去勾勒，或将其作为价值立场展开攻防战。前者对“五四”的理解偏实体化，后者则试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未实现的可能性、未兑现的口头支票。所谓回到“五四”，不是回到过去，而是回到未来，去重温五四人对中国未来、世界未来的想象与规划。返回历史现场，不仅是为了搜寻那些散佚的历史细节，更是为了激活“五四”之于当下中国的思想功能。以“五四”为后视镜（rear-view mirror）给未来导航，我们透过这个后视镜审视现在，倒退着驶入未来。

在当代中国的主体建构过程中，传统资源的复活固然重要，但离不开

^① 程凯指出，对历史细节及多样性的还原，固然可以改变我们对“五四”的刻板印象，但缺乏对认识装置的反思和整体史的抱负，会令细节堆积落入新意识形态的支配而不自觉。因此须充分认识到“五四”与当代中国的异质性，将“五四”作为思想操练的磨刀石，一块粗粝的而非打磨得过分光滑的磨刀石。（《重返“危机时代”——一种通向五四的路径》，《文艺争鸣》2018年第9期）

“五四”这一解毒剂。问题在如何创造性地转化“五四”的思想遗产，而不是当“五四”好像从未发生过。当“五四”逐渐从历史的光源变为黑洞，部分丧失其政治正确性时，恰是“五四”的精神遗产与当下中国发生化学反应、再度活化的契机。

第一章 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名与实

一、“反套”在《新青年》上

1920年代中期，鲁迅将他“五四”前后主要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杂感结集为《热风》，题记中追忆“五四”以后的情形：

但那时革新运动，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，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，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，嘲骂《新青年》的人们，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：新文化运动。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《新青年》身上，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，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，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，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。^①

这段追述中有两个动词值得注意，一是“另起”，一是“反套”。这两个词提醒我重新思考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个名目与《新青年》的关系。按鲁迅的说法，所谓“新文化运动”不是《新青年》同人的发明，而恰是《新青年》的反对派、革新运动的投机家“五四”以后另起的名目。

一年后为杂文集《坟》写后记，鲁迅又说“初提倡白话的时候，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。后来白话渐渐通行，势不可遏，有些人便一转

^① 鲁迅：《热风·题记》，作于1925年11月3日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292页。着重号为笔者所加。

而引为自己之功，美其名曰‘新文化运动’”，不久这类人又“二次转舵”，反过来嘲骂“新文化”。^① 鲁迅对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的理解，偏重于白话文的倡导、传播。在主张白话这一点上，“新文化运动”与《新青年》同人发起的文学革命确有竞争关系。但在鲁迅看来，“五四”以后勃兴的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其实是文学革命、思想革命之外“另起”的旗号，尽管这个旗号后来又被其发起者背弃，并“反套”在《新青年》身上。

由鲁迅所谓的“另起”与“反套”引出的问题是，谁发明了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个名目？要理清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名与实，及其与《新青年》的关系，鲁迅之说还不足为凭，须考虑其他同人对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态度。我关心的不仅是，对于“新文化运动”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更重要的是，为什么会这么说。这涉及《新青年》同人“五四”前后的聚散离合，思想立场的转移，社会地位的升降，尤其是在运动过程中的位置变化。

可以说我最初感兴趣的不是新文化运动本身，而是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个命名与《新青年》之间的缝隙。不加引号的新文化运动，是指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既有论述，以1915年《青年》杂志的创办，或1917年《新青年》北上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，即将新文化运动看作由《新青年》同人倡导的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一场文化运动^②。新文化运动作为事后追认的历史概念，无须加引号。给“新文化运动”加上引号，意味着由过

① 鲁迅：《写在〈坟〉后面》，作于1926年11月11日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285页。

② Chow Tse-tung, *The May Fourth Movement: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*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0. 中译本参见周策纵：《五四运动——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》，“导言”部分关于五四运动的定义，周子平等译，南京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。陈万雄《五四新文化的源流》（北京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7年）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，以《新青年》的创刊为标志，前期倡导的中心是《新青年》和北京大学。

去完成时回到现在进行时，试图把这个凝固的历史概念，融解为未定型的新名词，在“五四”之后被各种势力界说、争夺、批评^①。

周策纵梳理五四运动史时曾指出，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个词出现于1919年下半年，流行于1920年初^②。但他援引的最早出处并不确切，在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吸纳这一名词以前，“文化运动”或说“新文化运动”已被趋新的报刊广泛使用^③。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个词出现在“五四”以后，至少说明用它来指称“五四”以前《新青年》同人的主张，是一种“反套”。

“新文化运动”风起云涌的年代，同时也是《新青年》同人风流云散的两三年。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，倒显出“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”^④。鲁迅这种“寂寞荒凉”之感，或缘于以北京为阵地的《新青年》与“五四”后横向扩张的“新文化运动”在时空上的错位。“新文化运动”确实延续了《新青年》同人的基本主张，但已超出一家一派的掌控，成为

① 有海外学者认为“新文化运动”不是一个起止时间明确的运动，而是“五四”后流行的时髦语（buzzword），被边缘知识分子用来兜售各种已有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方案。参见 Elisabeth Forster, “The Buzzword ‘New Culture Movement’: Intellectual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China in the 1910s and 1920s,” *Modern Asian Studies*, Vol. 51, Iss. 5 (Sep. 2017)。

② 周策纵：《五四运动——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》，第七章“新文化运动的扩展”，七“对新文化运动不断加强的支持”。他认为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出自《新潮》第2卷第2号（1919年12月1日）上的记者答读者问。邓绍基指出陈独秀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7卷第1号（1919年12月1日）上的《调和论与旧道德》，是《新青年》同人中最早使用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的文本。（《关于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一名称》，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四集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）

③ 欧阳军喜指出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很可能最早由国民党人提出，见于《星期评论》第13号（1919年8月31日）刊发李汉俊（署名“先进”）《新文化运动的武器》；稍后《建设》第1卷第2号（1919年9月1日）刊载戴季陶《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》，称“新文化运动”是以科学发达为基础的“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”。戴季陶在《革命！何故？为何？》（《建设》第1卷第3号，1919年10月1日）中将“普遍的新文化运动”视为革命进行的方法，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“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个个人理智的自由发展”。参见欧阳军喜：《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——以〈星期评论〉〈建设〉为中心》，《南京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1期。

④ 鲁迅：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小说二集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245页。

各方势力争相攘夺的旗号^①。

“五四”以后《新青年》同人也卷入“新文化运动是什么”的话语争夺。被封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，1920年初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，提出他对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定义，然而只回应了“文化”是什么，忽略了何谓“新……运动”^②。陈独秀这篇演说与《文学革命论》的语调截然不同。前者只是复述当时思想界的共识，后者作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，完全是老革命党的口吻，“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，为之前驱”云云，尽管有煽动的嫌疑，却正符合他身为主将的立场^③。无论文学革命，还是新文化运动，可能都不是陈独秀关注的重点，但他在这两场运动中的位置感是不一样的。

对于“五四”后流行的“新文化”，胡适的态度前后不一。他起初极力撇清与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关系，曾在1920年度北大开学典礼上声明，自己“无论在何处，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”，北大也称不上是运动的中心。胡适以为“现在并没有文化，更没有什么新文化”，只有一种新动机、新要求，“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”^④。从何时起，他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变为“我们的”？在作于1922年的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中，胡适已将文学革命、思想革命与五四事件、新文化运动合二为

① 周予同认为“五四”前后《新青年》最初把握着思想界的权威，但后来研究系的梁启超、张东荪、张君勱等组织共学社，出版《解放与改造》；国民党的胡汉民、戴季陶、沈定一等抱着改组党务之见，出版《建设》及《星期评论》，“与自由派的《新青年》成为鼎足的形势”。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所以渐趋黯淡，失去青年的崇奉，反不能与研究系、国民党争衡，是因为胡适辈“自由思想的空气太浓，讲坛派的态度太重”，徘徊于浮泛的文化改造，不能顺应时势，从个人本位转向集团本位，触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。（天行：《第四期之前夜：向青年们公开着的一封信》，《一般》第6卷第1号，1928年9月）

② 陈独秀：《新文化运动是什么》，1920年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发表的演讲，原载上海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3月21日，收入《新青年》第7卷第5号，1920年4月1日。

③ 陈独秀：《文学革命论》，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6号，1917年2月1日。

④ 《胡适之先生演说词》，陈政记，《北京大学日刊》，1920年9月18日。

一，“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，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”^①，“况且‘五四’运动以后，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‘思想革命’的重要”，“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”^②。胡适给“文学革命”加上“运动”的后缀，称之为“新文学运动”，在构词法上也有向“新文化运动”靠拢之势。

在读解陈独秀、胡适关于“新文化运动”的表态时，须考虑到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二人经“五四”而暴得大名，其实是“新文化运动”的直接受益者。正如一位北京学生给胡适写信说，“自来谈新文化的人，必要连带想到提倡的人，而阁下与陈君（独秀）之名，亦随借此发达。但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，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”，所以陈、胡二人自然要替“五四”张本、替新文化辩护^③。

与被视为领袖的陈独秀、胡适不同，周氏兄弟到“新文化”的势头过去以后才发言。1924年周作人给《晨报附刊》编辑孙伏园去信“反对新文化”。作信的缘由本只是北大内部的男女纠纷，周作人却取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题目，以致孙伏园在编者按中解释这个题目是来信原有的，“其中‘新文化’似应作‘所谓新文化’解”。在这封信的末尾，周作人道出他“反对新文化”的题意：“中国自五四以来，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，到了今日变本加厉，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，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，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，真是可怜悯者。”^④

① 据五四运动亲历者杨亮功回忆，五四当天唯一的宣传品，是印有“北京学界全体宣言”的传单，共印二万份。宣言由罗家伦执笔，用白话文写就。（杨亮功口述、秦贤次笔录：《五四运动六十年》，台湾《东方杂志》复刊1979年第12卷第11期）可见学生运动彰显了白话文动员民众的效力，扩大了白话文的社会影响。

② 胡适：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，1922年3月作，《申报》五十周年纪念刊《最近之五十年》，1923年2月。

③ 1922年2月17日铁民致胡适信，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上，北京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03页。

④ 陶然（周作人）：《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》，《晨报附刊》1924年5月16日；收入《谈虎集》上卷，北新书局，1928年，第170页。